

主编 刘建美

洋人在中国

红色使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洋人在中国

红色使者

主 编 刘建美

副主编 高 翠 司 卫

撰 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司 卫 吴 燕

刘建美 刘 静

苏小玉 苏克标

高 翠 康建兰

张俊勇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人在中国. 红色使者/刘建美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03-05209-5

I. 洋... II. 刘... III.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353 号

洋人在中国——红色使者

- | | |
|---|------------------------------|
| 主 编: 刘建美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蒙莉莉 |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分公司 |
|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 |
|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
| 邮 编: 030012 | 印 张: 13.75 |
|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 字 数: 130 千字 |
| 0351-4922208 (综合办) | 印 数: 1—4000 册 |
| E-mail: Fx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
| Web@sxskcb.com (信息室) |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Renmshb@sxskcb.com (综合办) | 定 价: 22.00 元 |
| 网 址: www.sxskcb.com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外人”来中国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汉代。公元前53年,也就是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动用了7个军团约4.5万人,发动了对古称安息今称伊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罗马军队侵入伊朗后,遭到伊朗军队的围歼,6000余罗马军队突围,逃至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公元前33年,西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率军西征,与该罗马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将之收降,并带回中国,安置在永昌县。后来这些罗马军人渐渐改称汉姓。虽经1000多年的同化,但现在永昌地区部分原汉代罗马军人后裔,特别是宋、张、曹、蔡、李等姓的罗马人后裔,其相貌仍然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特征。

在汉代,除了上述罗马军人来华,其他的来华“外人”都是东方的亚洲人,主要是印度的僧人或西亚的商人,还有西亚国家来汉的使者。欧美的那些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来华,目前还只能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时代。

在中国古代,中国人一直狭隘地认为,中华本土以外的人都是愚昧野蛮的未开化“蛮夷”。对于“蛮夷”,古代的统治者通常妄自尊大地以鄙视和屈尊的态度对待。即使明智的君主,也通常以怜悯和仁慈的态度,或赠送玉帛,或御赐封号,来对待“万方来朝”的“化外之民”。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近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真正的大批的“洋人”来了。虽然鸦片战争失败了,清政府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中外事务也摆在面前,但清政府鄙视“外夷”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仍将西方来的“洋人”称为“夷人”,将所办理的对外事务称为“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对“夷人”、“夷务”这一鄙视性称呼极为不满的西方列强,乘着清朝再次战败之机,强迫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虽然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清廷官员不再对西方人以“夷人”相称,但私下里仍是旧习难改。同治六

年,也就是1867年,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宝鋈、吏部尚书文祥等上奏,仍将所汇编之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1850—1861)的内外臣工奏折、义民信札、所有对外事务文件,共80卷16函文献,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民间的“夷人”或“蛮夷”称呼,更是普遍。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蛮夷”、“夷人”和“夷务”的称呼才逐渐消失。

1840年至1919年期间,来华的“洋人”主要是外交往来时的官方公使、战争时期的军队、来东方淘金的商人、走乡村串城镇的传教士。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多是以侵略者、掠夺者、剥削者的身份被中国人民所认识的。

进入民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一些友好人士也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前来红色区域,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代表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对中国革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其他领域的交流,如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在“洋人”来华上有较多的体现。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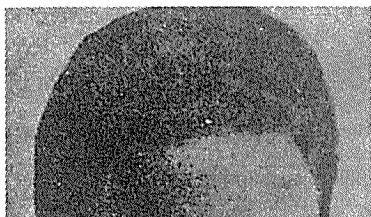
百年来,“洋人”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人民对洋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客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也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程。这里,我们选取30多位对百年来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来华洋人,对其在华事迹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叙述,力图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在对人物的描述中,我们既要深刻地反映历史,又要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做到理趣兼容,赏读两宜。或许她不够完美,但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喜欢她。

目 录

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 维经斯基	/ 1
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	/ 18
苏俄派来的红色使者： 鲍罗廷	/ 36
北伐军中的苏联顾问： 加仑	/ 54
毛泽东称为“蠢货”的共产国际代表： 罗易	/ 71
工农红军的洋顾问： 李德	/ 85
把革命的火种带到越南： 胡志明	/ 102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白求恩	/ 121
定居北京的美国记者： 斯特朗	/ 143
美国的红色作家： 史沫特莱	/ 156
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 埃德加·斯诺	/ 178
印度援华医生： 柯棣华	/ 194

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 维经斯基



争,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服苦役。在这里,他联合岛上的政治犯举行暴动,并一举成功而声名大振。重获自由后,维经斯基加入了共产国际,并被指定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这时,维经斯基已成长为一名忠诚、勇敢而又能担当重任的革命者。

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

1920年3月,苏俄和共产国际得知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亟须了解中国革命状况,以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维经斯基一行密赴中国执行共产国际的一项神圣使命:考察中国革命形势和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时与维经斯基随行的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经过周密的准备,同年4月,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来到了中国。

维经斯基来华后,首先到了北京。初次来华,人地生疏,开展工作有很多困难,他便想方设法与革命分子取得联系。很快,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的介绍,他会见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李大钊久仰俄国十月革命,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革命圣地的维经斯基一行。在李大钊的安排下,维经斯基一行与中国进步青年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演讲会。中共早期党员罗章龙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座谈的情形:“(维经斯基)文质彬彬,学者风度,能操英语、德语交谈。在谈话中表示他来华前对中国问题做过充分研究,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通过座谈,维经斯基介绍了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维经斯基适时地给予指导。热情奔放的维经斯基辩才横溢、思想进步,一系列座谈大大开阔了中国进步青年的视野。维经斯基就像来自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火种,并开始在中国大地点燃。经过接触,中国进步青年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走俄国人的路。

根据当时革命的发展形势,维经斯基不失时机地与李大钊等人

讨论了建党问题。维经斯基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大钊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就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并立即会见了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等人。在交流中，维经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存在的问题：“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潮的运动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经过反复酝酿，决定由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党纲草案。随后，北京、广州、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建立起来了。这直接为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果然，维经斯基不负共产国际的期望，来华不到半年，他的工作便取得了重大进展。正由于维经斯基的这种特殊身份和重大贡献，才使得他在中共党史上流芳千古。

在帮助建党的同时，1920年8月，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以及杨明斋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输送赴苏俄学习的中国革命青年补习俄文。同时，为真实地报道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情况，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下，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内设立了我党的第一个通讯社——华俄通讯社。

维经斯基一行来华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还要广泛了解中国各政治派别的状况。为此，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同孙中山会见。这是共产国际的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维经斯基后来回忆这次会见：“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45岁到47岁（实际上他已经54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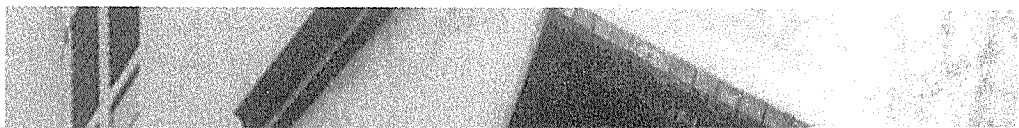
衣领,中国大学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会晤中,孙中山询问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并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这次会见使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有了初步、直接的了解。随之,维经斯基等考察了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并访问了当时吴佩孚、陈炯明等一些军政要人,掌握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状况的第一手材料。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共产国际认为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基本完成。12月,维经斯基受命从上海启程回国。维经斯基的第一次来华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正式建立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准备时期便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虽然这时维经斯基已经回国,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这次大会能圆满成功,不能不说与维经斯基在中国近一年来的



在维经斯基
图为该组织运



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对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重大历史意义,李维汉曾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事业是有功劳的、有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立是共产国际帮助的。当然终究是要产生的,但产生那么早是他们帮助的。”

但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第一次来华,也初步暴露出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法上的错误端倪。正如李维汉所说:“那个时期的中国党还属幼年,还需要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但据我所知道的和听说的,国际代表们的方法不太好,不是告诉小孩子如何吃饭,而是代替小孩子吃饭,代替小孩子走路,有好多文件都是他们代替起草的,这总是不好的。”



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自此以后,他的命运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

数度来华指导国共合作

1921年1月,正当维经斯基回国途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主持工作。同年春,维经斯基回到伊尔库茨克,担任远东书记处秘书工作。由于舒米亚茨基兼职过多,维经斯基实际负责处理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等,由于维经斯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太雷担任了中国科的科长,并于6月前往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情况。

1922年2月,维经斯基随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撤销而调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负责与中国方面的联系工作。在此期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共合作开始酝酿。此后,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维经斯基在中苏遥远的路途间来回穿梭。但这时共产国际已将马林、鲍罗廷等代表派驻中国,维经斯基的权威性已有所下降,他的工作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临时性或辅助性的上送下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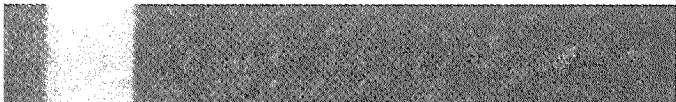
1922年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这个建议遭到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为了与共产国际沟通,4月和6月,陈独秀两次写信给维经斯基,要求他向共产国际转述他反对马林的理由,并表达了亲自到莫斯科的迫切愿望。维经斯基如实地将陈独秀的意见向共产国际作了转达。但这时,维经斯基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似乎已不具影响力。

7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与国民党联合,并将中共中央委员会驻地迁往广州。随后,经共产国际开会研究,由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领后,应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

党的一切工作。”

1922 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并同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在这次大会上,维经斯基既反对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工人阶级力量,实际上拒绝统一战线策略的“左”倾宗派主义,又反对过低评价工人阶级力量,夸大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革命性的右倾倾向。他主张在统一战线范围内推行国共两党合作,但对国民党应抱警惕和

慎重态度。后来,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维经斯基直接参与制订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参与制定了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但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之合并,也决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实践证明,这对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促成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迎接第





之后,维经斯基在廖仲恺的陪同下,第二次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维经斯基详细询问了列宁逝世后苏联的情况,维经斯基则进一步了解了孙中山的思想。这次会见后,维经斯基肯定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同时也认识到其革命不彻底、不坚决的弱点。他指出:“国民党虽具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传统,但就其成员的社会成分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国民党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北洋军阀的斗争的。但是他们缺乏决心和勇气来改变航向,使自己的全部政策转到劳动群众的利益方面来……和国民党共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和年轻的中国知识界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宣传和演讲,逐步地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去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去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无疑,维经斯基的眼光是敏锐的,他早早地就看到了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问题,并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警告。

1924年6月,张继、谢持等国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密切。1922年6月,陈独秀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

Всесоюзны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11/10 1922
Секретариат
С. В. Кривичев
1922